

北京历史文化学术讲座

金 代 的 中 都

苏 天 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辅导部 联合主办

1986年10月·北京

目 录

第一节 金宋对峙与迁建中都	(1)
一、女真的兴起	(1)
二、金宋夹攻燕京和昙花一现的燕山府	(2)
三、金军攻宋(金对两宋的战争及海陵伐宋的自取灭亡)	(2)
四、海陵王夺取王位与迁都	(4)
第二节 金中都城	(6)
一、金迁都前残破的南京城	(6)
二、金中都的扩建	(7)
三、中都的宫殿、园囿、坛庙	(8)
第三节 中都的经济与文化	(11)
一、中都的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漕运、水利、建桥)	(11)
二、中都的文化(女真大小字、教育、诗词、散曲、戏剧、医学、天文学)	(15)
第四节 金与蒙古的战争	(18)
一、蒙古军对中都城的威胁	(18)
二、金迁都汴梁	(19)

金代的中都

第一节 金宋对峙与迁建中都

一、女真的兴起

女真的先世，称为肃慎，周初接受周王朝的册命，隶属于周，《左传》载其地属周之“北土”^①。汉魏以后又被称为挹娄、勿吉、靺鞨，到了五代时期，靺鞨改称女真，女真人原出自黑水靺鞨，渤海国强盛时期，黑水靺鞨的一部份，隶属于渤海。辽灭渤海后，随渤海人南徙，契丹称他们为女真，据《金史·世纪》：“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②按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称之为“生女真”、“熟女真”、“回跋女真”，“生女真”不隶属于契丹籍。

辽代女真族受契丹的控制，每岁纳贡当地土特产，如青鼠，貂皮、胶、鱼皮等，辽在其地设置官府。

辽末，女真人对契丹统治者的压迫和掠夺极其不满，早在建国前女真人的领袖阿骨打就进行抗辽斗争。

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人领袖阿骨打发动抗辽斗争，与诸路兵汇合举行誓师大会，控诉契丹统治者的罪状，按《金史》：“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疏，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③通过这一段记载，说明女真与契丹之间的矛盾进入白热化，阿骨打率兵攻下宁江州城，并利用契丹、渤海、辽籍女真等被压迫人民反对辽统治者。荒淫无道的天祚帝召集群臣讨论对策，选精兵七千余人反击，但士无斗志，望风而溃，女真大胜，俘获兵器物资不计其数。

阿骨打于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继皇帝位，国号为金，按《金史》：“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④。按上述记载阿骨打定国号为金，是与辽王朝针锋相对，取宁江州后，继续进兵达鲁古城（今郭尔罗斯前旗的塔虎城）歼灭辽军于阿娄冈。

收国元年（1115年）十一月，天祚帝率兵七十万亲征，阿骨打早有防御，当两军对峙之际，辽耶律章奴发动了政变，拟立燕王耶律淳为帝，天祚帝得知后急返，金军乘虚直追，辽军大溃，死者不计其数，乱屍遍野，长达百里余，此间，由于辽王朝统治者内部不断发生叛变，各族人民起义反辽，促使辽王朝濒于灭亡。

①《左传》召公九年。

②《金史》卷一《世纪》。

③④《金史》卷二《世纪》。

天辅元年（1117年），攻下长春州、泰州、后续克拔显、乾、懿、褒、徽、成、川、惠等州。天辅四年（1120年），占领了上京临潢府。翌年，辽都统耶律余睹等诣威州降，转年又克高、恩、回纥三城，又下中京及泽州，辽王朝临于崩溃。

二、金宋夹攻燕京和昙花一现的燕山府

辽王朝的末日到来，必然威胁北宋王朝，早在宋太宗时，屡想收复燕云十六州，但皆失败，因此宋王朝乘金攻辽之际，收复燕云。天辅四年（1120年）宋派赵良嗣与阿骨打谈判，为收复失地，双方商定出兵共同伐辽。金兵攻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兵攻辽燕京析津府，如果举事成功，宋朝就把原来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献给金朝。但是，童贯统领的宋军被辽兵击败。天辅六年（1122年）辽将郭药师等以涿、易二州降宋。童贯又利用郭药师为向导，督常胜军五千人偷渡卢沟河，混杂在老百姓当中，破迎春门，攻入燕京，列阵于悯忠寺（今法源寺）。但由于援军违约未到，又被辽军打得大败，伤亡惨重，横尸塞路。郭药师夺门不得出，缒城而下，败归者仅数百骑。童贯为了逃避这次失败的责任，秘密遣使前往金营，请求金军攻打燕京。金太祖阿骨打率兵亲征，一举攻克了燕京。

金太祖攻占燕京后，以宋朝不出兵夹攻辽军为理由，提出燕京交给宋朝的条件是：第一，给米二十万石；第二，将原来宋朝给辽的“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转献给金；第三，每年还要给“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宋徽宗一律应允。于是金天会元年（1123年）四月，金兵自燕京退走，将燕京财物、丁口掠夺一空，形成“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悲凉局面。童贯等进入燕京，接收了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

宋朝得到这座空城后，大肆吹嘘这次的“凯旋”，百官也纷纷上表祝贺。这就是所谓收复“燕云”的胜利。宋朝在燕京设燕山府。宋朝廷以左丞王安中为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郭药师为检校少保同知府事。又尽出内府所藏金银、玉器、瓶炉、砚几等，送往燕山府城陈设，以为张饰。宋得燕京三年，毫无建树，又值民力疲困，连年凶荒。宋朝把南京改为燕山府后，王安中知燕山府，府库斗粟无存，军队所需给养皆靠河朔、山东、河东索取，民怨四起，燕山府的残局已无法维持。

三、金军攻宋（金对两宋的战争及海陵伐宋的自取灭亡）

金太祖阿骨打亡后，弟吴乞买嗣位，天会三年（1125年）十月，下诏伐宋，兵分两路，以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自西京入太原。以六部路军帅挾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副之，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阖母副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以宗望为主帅，自南京入燕山。燕京守将郭药师率众降金，引金军南下，直至汴京城下，徽宗逃亡，残局由钦宗支撑，向金乞和，派出亲王为人质，并献出太原、中山、真定三镇，并毫无羞耻地向金以叔侄为称，甘作儿皇帝，金方应允，后因宋将姚平仲率兵偷袭金军营，事败后金军复包围军营，宋派使臣来金媾和，但金继续南下，攻下太原、平阳府，破怀州直取西

京（洛阳）围困潼关，后包围汴京城，钦宗降。天会五年（1127年），将徽宗与钦宗押回燕京，宋徽宗被关在延庆寺。

金灭北宋以后，中原地区还保存北宋以来的生产方式，这是因为用女真族的奴隶制在中原地区是无法进行统治的，因此，想出以汉治汉，设立傀儡政权，从中“坐收渔利”的妙策，遂立张邦昌等傀儡政权。《大金国志》卷二十四《宣宗纪》记载孙大鼎说：

“忠献（宗翰）惧亟取，则百姓难于政化，故先立张楚，次立刘齐”。

张邦昌是北宋末的一个无耻之徒，被金立为大楚皇帝，定都金陵（今南京）。

北宋亡后，康王赵构在归德继位，改元建炎，史称南宋，高宗继位后，除掉张邦昌，但国事仍处于苟延残喘，在金军的威胁下，继续南逃，直至扬州。

天会六年（1128年）正月，金军攻克邓州、襄阳等地，并连下均州、房州，同时又向陕西进军，攻下同、华、京兆、凤翔。七月，太宗下诏继续追踪南逃的宋高宗。天会七年（1129年），宗翰派遣拔离速领兵奔袭扬州，赵构南逃建康，并遣使向金朝求和，金太宗不允，派大军渡江直逼建康，建康守臣陈邦光 and 江淮宣抚使杜充皆降金，赵构逃至越州，后又逃明州，最后潜入温州，金军入海追击数百年，不知去向乃还军。

金军屡次南侵，意在掠夺财物，因其战线较长，无意久留南方，况南侵途中屡遭人民反抗阻击，再加上兵士不习惯于江南的气候和水土，一时难以灭亡南宋。

金熙宗时，由于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深化，再加上各地人民抗金的力量日益壮大，在此历史条件下，金、宋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金朝无力取胜，此间曾有两次与宋议和，这是金、宋关系一大转变。

天会十五年（1137年），宋徽宗亡，赵构的帝位不再感到威胁，遂派王伦以“迎奉梓宫使”的名义至金朝，请求归还河南、陕西等地。此时因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恶化，天眷二年（1139年），虽达成金、宋议和，但其条件宋对金称臣，并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熙宗允许将河南、陕西归还宋朝，并将韦太后及徽宗棺槨南还，此即谓绍兴九年的议和。

天眷三年（1140年），熙宗下诏又取河南、陕西等地。皇统元年（1141年），破寿春渡淮河，攻克庐州，后金军与宋军大战于柘皋镇，金军大败，宋收复庐州。其后金、宋再度议和，宋再次称臣，贡纳银、绢。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并割让唐、邓二州以及陕西、商、秦二州之半，此即谓绍兴十一年再度议和。

海陵王继位后欲想灭南宋，统一全国，海陵问李通：“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卿意如何？”李通回答说：“天时人事不可失也”。翟永固则表示异议：“燕都始成未及数载，帑藏之匮乏未补，百姓之疮痍未痊，岂可再营汴都而重劳民哉！江南乃继好之邦，发以厚币礼陛下，岂可无名出师而重劳征伐哉！臣谓二事俱不可”。敬嗣晖赞同李通，韩汝嘉赞同翟永固①。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海陵王周围对伐南宋的看法不一致，但劝戒海陵王南进的一派是切合实际的。《金史》载：“海陵将伐宋，宰欲谏，不得见。会元妃有疾，召宰诊视。既入见，即上疏谏，其略言：国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无道，曾不十年，荡辽戡

①《三朝北盟会编·正隆事迹记》

宋。当此之时，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谋勇之臣，然犹不能混一区宇，举江淮、巴蜀之地，以遗宋人。况今谋臣猛将，异于曩时。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加以大起徭役，营中都，建南京，缮治甲兵，调发军旅，赋役烦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间者彗星见于牛斗，荧惑伏于翼轸。已岁自刑，害气在扬州，太白未出，进兵者败，此天时不顺也。舟师水涸，舳舻不继，而江湖岛渚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产，天下哀之。慕容彦超，宰掣也，海陵疑奏疏戢为之。辞曰：实不知也。海陵犹杖笞。召禁中诸司局官至咸德门，谕以杀宰事”。通过祁宰传记述可看出海陵伐宋之志已定，再无人敢上谏词。于是海陵造汴京官室，遣左丞相张洎与敬嗣晖按其意在汴京大兴土木，作为伐宋之前奏。张洎预感南侵之不利，更不能正谏，遂婉言以天时地利之不当相劝，海陵仍不从，后举国调兵遣将，作好侵宋准备。据《金史·李通传》载：“海陵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尝曰：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通揣知其意，遂与张仲轸、马钦、宦者梁琬近习群小辈，盛谈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为谋主，遂议兴兵伐江南。四年二月，海陵谕宰相曰：宋国虽臣服，有誓约而无诚实，比闻沿边买马及招纳叛亡，不可不备。遣使籍诸路猛安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壮充军，仍括诸道民马。于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子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①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海陵南伐之决心，于正隆六年（1161年）九月，海陵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兵分四路进军，渡淮进取扬州，从海上攻临安。金军虎头蛇尾，溃败于杨林口，军心动摇，自相残杀，完颜元宜等部份将领率众起事，最后海陵被乱箭射死于营帐，结束了金、宋的战争，海陵以引火自焚告终。

四、海陵王夺取王位与迁都

金熙宗完颜亶继位后，立足于社会改革，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消除女真族旧的保守势力，铲除宗室构难。在天眷二年（1139年），对群臣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竭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②。上述对话是熙宗与他的老师叙述，改革虽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但这必竟是女真统治者代替旧的保守势力的发展，首先诛高庆裔废刘豫，继而杀宗磐、宗隽和挞懒，又杀希尹与萧庆，最后消除宗翰派的旧势力。

熙宗的改革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况变化，废除了勃极烈制，采取汉官

①《金史》卷八十三《祁宰传》

②《金史》卷四《世纪》。

制，设行台尚书省，南徙猛安谋克，废承袭制度，规定汉人和渤海人不得为猛安谋克户。颁行“皇统制”，积极恢复生产，把流民奴婢放还其乡，得以安生，减轻人民赋税徭役，社会得以安宁。

海陵王完颜亮为宗干第二子，宗干通晓女真人和汉人的文化，在熙宗改革时期是个有功绩的人，其养子金熙宗以祖嫡孙嗣位，完颜亮早已记恨在心，为了夺取王位，其手法极其隐蔽，积极支持熙宗的改革，同时在改革时期暗中勾结反对改革的旧保守势力，以谋求夺取王位的目的。

熙宗在位时，为了清除改革的阻力，宗室多人被杀，因此，树立了很多政敌，支持海陵王政变的有四种人，萧裕和高怀是主要策划者。萧裕为奚人，在中京时与海陵结识，此时即向海陵献策，并表决心为其出力，海陵被贬时过北京，与萧裕密谋，首先在河南建立国号，次而举兵北上还朝。但事未能如愿，未几海陵被召还朝。旧势力代表人物秉德、唐括辩、乌带皆是阴谋集团的积极成员。熙宗的亲信大兴国，因错被杖，愤恨在心，海陵借此机会与兴国勾结，以便举事闯宫时里应外和。另外还有徒单阿里出虎、仆散师恭等人皆出过大力。据《金史》载：“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旧受宗干恩，徒单阿里出虎与海陵姻家。大兴国给事寝殿，时时乘夜从主者取符钥归家，以为常。兴国尝以李老僧属海陵，得为尚书省令史，故使老僧结兴国为内应，而兴国亦以被杖怨熙宗，遂与亮约。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内直。是夜，兴国取符钥启门纳海陵、秉德、辩、乌带、徒单贞、李老僧等入至寝殿，遂弑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属。忽土曰：“始者议立平章，今复何疑”。乃奉海陵坐，皆拜，称万岁。祚以熙宗欲议立后，召大臣，遂杀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是日，以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辩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为平章政事，忽土为左副点检，阿里出虎为右副点检，贞为左卫将军，兴国为广宁尹。于是自太师、领三省事以下二十人进爵增职各有差。”①上述记载是海陵王组织政变的经过，为了夺取王位他将宫廷内外无论是支持熙宗的革新势力或是反对熙宗的保守势力都利用起来，于皇统九年（1149）杀了金熙宗，夺取政权，作了皇帝，改元天德。在位十二年，统治者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虽处于相持局面，但海陵继续巩固政权统一制度，向江南进伐作为他执政的目标。在他的诗中写道：“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测，立马吴山第一峰”。由此可见，海陵执政期间不仅是向南宋进伐中戎马的繁重，而且在一系列改革中新旧势力的斗争，比起金熙宗时期更为激烈，为了加强和巩固王位启用了非女真族人，大批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被任用。如天德二年（1150），任渤海人 大臯（即挾不野）为行台尚书右丞相，任汉人张通古为尚书左丞，任渤海人 张浩 为 尚书右丞，任奚族人肖裕为平章政事，自此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统治集团，这种作法博得各族地主，士大夫统治阶级一致的拥护，对女真贵族的保守势力加以镇压，如天德二年（1150），杀太傅，领三省事宗本，尚书左丞相唐括辩，判大宗正府事宗美，遣使杀领行台尚书有事秉德，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周宋国王翰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综上所述，海陵为了加强和巩固他的统治不得不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保守势力，以便推行他新政中各种改革方案。

天德元年（1149），内使梁汉臣向完颜亮进言：燕京“虎视中原，为万世之

①《金史》卷五《世纪》。

基”，应先“修整内苑，然后迁都”。完颜亮采纳了梁汉臣等迁都燕京的建议。在此期间，海陵王曾颁布“求言诏”，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都可上书献策，上书者多数提出迁都燕京，其理由为上京地理位置远在一隅，对金统治经略多有不便之处。天德三年（1151）四月，海陵下诏迁都，令尚书右丞张浩等人主持改建燕山都城。张浩精通汉文化，曾在太宗、熙宗时，前后受命修宫室、定朝仪，“管勾御前文字”。后主持六部政事，海陵继位后，浩行参知政事，又进升为尚书右丞，完成扩建燕京都城。工期为三年，城周长九里三十步，宫城建三十六殿，楼台亭阁林立，金壁辉煌，内城西门外建有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为统治者游乐场所。

由上都会宁迁都燕京，是海陵王一项重大政治变革，一则是摆脱女真族的旧势力，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道路。一则是便于控制中原及其他地区的金朝现有版图，以便继续南下伐宋。迁都对金朝统治者来说是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第二节 金中都城

一、金迁都前残破的南京城

辽天显十一年（936）将幽州城升为陪都称南京，城址基本未动，不过在旧的唐藩镇子城（即唐幽州城）改名而已。按《元和郡县补志》说：幽州城制，南北9里，东西7里，城周合为32里，折今尺24里，这种说法是符合现代所调查材料的，在白云观后有夯土墙一段，已确定为城墙的北壁，白云观以西京包铁路西20米处也有一段夯土墙，这是城墙的西壁，东壁和南壁已无处可寻，根据《日下旧闻考》、《春明梦余录》、《顺天府志》等书记载，尚可查出一些线索。《寄园寄所记》云：“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漫胡同尤甚，深底各二丈，疑为幽州城故濠”。《光绪顺天府志》谓其说近是。又石驸马大街东，旧有大明濠，甚宽广，直抵城下闸口，而入于护城河，疑即幽州城濠东北端。这一段的记载证实了城垣东壁的位置，此外1952年十一月在姚家井第一监狱门前发现了一个唐墓，按一般情况墓葬多在城外，由此墓南北作线延伸，恰贯自新路、丞相胡同，与法源寺相距极近，烂漫胡同为幽州城故濠所在，亦信而有证。城垣东西北三壁即得，可推知南壁应在贾沟村附近。

按上述考据的遗址，可知辽南京城的大致轮廓，辽统治者为了继续南下，南京城在军事上成为军事堡垒，因此，南京城配置有坚固的敌楼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设城门八座，城的西南角为大内，幅员五里，大内中虽建有元和、仁政、洪政等殿宇，不过是为辽统治者在外巡幸游乐作短暂停留的场所，平时委以重臣留守南京，管理政事，另设统军司转运使等机构，以司军政要事及管理财赋等项事务。

辽代中期以后，由于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南京盗贼四起，民不聊生，辽末天祚帝对燕京地区人民榨取更甚，正额课税高达五百四十九万之巨，其它勒索繁多，百姓难以生存，反辽起义事件多起，辽统治者派兵镇压后，被迫南走投宋，南京城已是摇摇欲坠，宋、金联合伐辽，对南京城来说更是造成严重的破坏，郭药师攻入南京城，直达悯忠寺，烧、杀、抢、掠，直至溃败弃城后，又遭败兵洗劫。

天辅六年（1122）十二月，金兵从居庸关、德胜口分两路南下，直逼南京城，辽宰相左企弓、枢密使刘彦宗出城投降，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南京城中财物、丁口掠夺

一空，宋朝统治者以重金赎回的只是一座空城，即所谓宋朝所设置的燕山府，当时金人将燕京城的城壁楼橹全部破坏，城池中的富实人户皆被迁出，达三万余户，寺院民宅财物席卷而空，这座残破的城池，已接近废墟之貌。

宣和五年（1123），金军卷土重来，又掠富户北迁。宣和七年（1125），金以败盟纳叛为借口，大举伐宋，从此燕山之地又重新落入金朝版图范围之内。

天会五年（1127），金灭宋后将徽宗、钦宗及其宫室眷属及皇亲等三千余人，并宫室所有财物包括珍宝文物、天文仪器、图书等押送燕京，另外所俘获的将人、歌妓大多安置在燕京。金占领燕山府，复名南京，并将原设在平州的南京中书枢密院移到此地，以便征收税粮。

中都城历经了战争的硝烟和强盗式的掠夺，使中都城变成一派凄残景象。由于女真族的残暴统治和掠夺以及他们推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了南京城周围人民的反抗，演化了以后这个地区周围此起彼伏、声势浩大的人民抗金运动。

二、金中都的扩建

中都城的扩建是在辽南京旧城池上拓展的，按《大金国志》记载。都城周围七十五里，此种说法争议很大，因就现有的城池遗迹实为错误，明洪武元年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其所指南城即为元大都之南，金之中都城旧城池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合明尺三十三里左右，可见七十五里之说确为误载。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海陵迁燕诏说：“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为其确证，是当时未曾拓筑变革的仅有北壁一面。西城墙，目前还有许多残迹，最高处约一丈许，分布在今马连道仓库、蝎子门、高楼村、凤凰咀一带。北端在羊坊店东南角，城根关家园子一带。南端在凤凰咀村的西南角。这些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是金代西城垣保存较长的一段，南城墙从凤凰咀西南角东转延着村南有自西向东一条水渠，估计可能是金代的护城河遗迹，东到万泉寺、石门村、霍道口、祖家庄、菜户营等村，也有连续不断土丘形的城墙遗迹。东城墙四路通以北是永定门车站，以前这里有一道土岭叫做窑岗子，岗子内外曾发现过很多辽代墓葬，这是金中都城的东城墙遗址，北至黑窑厂、梁家园还可以看出较高的台地，《皇明文衡》卷三十七列定之“游梁氏园记”记载梁家园外有旧城遗迹，称为萧太后城，更进一步证实东墙垣的方位。北城墙已无迹可寻，是否与辽南京北城在一条线上目前尚不敢确定，1956年永定河引水工程中，在白云观护城河北岸发现了很多石雷和金代的铜钱，这些石雷都是守城用的抛机的石炮弹，可以证实了北壁的存在。

《金史·地理志》载：“海陵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府一，领节镇三，刺郡九，县四十九。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颍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按《大金国志》记载有城门十二，城墙四壁各设三门，名称皆同，唯有城墙北壁少光泰一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金中都城的考察，得知北壁确系四门，《北京历史地图集》也按此考古调查绘制出金中都图幅。

营建中都，工程浩大，工期紧迫，督工严酷，征调百万工匠、夫役辛勤劳动。在筑

城时，用涿州黄土，人手一筐，一字排开，自涿至燕，往返传运，空筐传出，实筐传入。历时三年，才告竣工。中都的宫殿是仿照汴京（今开封）建筑图样营建的。宋使范大成见中都宫殿宏大侈丽过于汴京。《海陵集》记载：中都“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中都宫殿就象秦的阿房宫、汉的建章宫一样宏伟壮丽。

贞元元年（1153年），金主完颜亮以新都城池宫殿告竣，便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境）迁都燕京，改燕京名为圣都，不久又改称中都，并改析津府为大兴府。从此，北京正式成为皇都，并成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

金朝政治中心中都，城市人口比辽南京增加很多，大约有二十万人左右。城中居民划分为许多坊。据《元一统志》记载，中都有六十二坊，坊名及街道可考的有：时和坊，在今广安门大街路北一带；奉先坊，在今长椿街周围；延庆坊，在天宁寺附近；仙露坊，在今菜市口周围；荣荫坊，在今西便门大街一带；显忠坊，在今牛街附近；会仙坊，在今白云观一带；富义坊，在今陶然亭迤西；玉田坊，在今南横街东等。

中都正式成为金的国都后，在海陵王统治下，中央官制最高的是尚书省，置尚书令一人，总管国政。下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这些中枢机关都设在皇城里面，多高的官员都由女真人担任，中下级官吏汉人最多，契丹人较少，这是为了拢络汉人，巩固其政权。

为了加强中都的管辖，在中都京畿设中都路大兴府，领十县。居民成份复杂，除汉、女真、蒙古、契丹、奚等族外，还有不少往来西域的回鹘人也定居在这里。此外，从汴京俘虏的工匠、医生、乐人、技艺等都安置在中都，使中都的文化、技术得到了更快的发展，成为一个北方繁华富丽的都市。

三、中都的宫殿、园囿、坛庙

金中都城的皇城宫阙因辽人行宫而建，在燕京城的西南隅。《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八月丁丑，策试进士于悯忠寺，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西达于宫。考官完颜蒲捏、李晏等以为文运始开，得贤之兆。”由此记载可以定出中都城的方位。笔者于1957年至1964年期间曾在广安门椿树馆一带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试掘，这一带表土层分布了大量的金代砖瓦及建筑上所用的琉璃饰件和精美的钧瓷残片，证实此地确系中都的宫阙遗址。

《金史·地理志》：“浩等取真定府潭园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应天门十一楹，左右有楼，门内有左、右翔龙门，及日华、月华门，前殿曰大安，左、右掖门，内殿东廊曰敷德门。大安殿之东北为东宫，正北列三门，中曰粹英，为寿康宫，母后所居也。西曰会通门，门北曰永明门，又北曰昭庆门。东曰集禧门，尚书省在其外，其东西门左、右嘉会门也，门有二楼，大安殿后门之后也。其北曰宣明门，则常朝后殿门也。北曰仁政门，傍为朵殿，朵殿上为两高楼，曰东、西上阁门，内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宫城之前廊，东西各二百余间，分为三节，节为一门。将至宫城，东西转各有廊百许间，驰道两旁植柳，廊脊覆碧瓦，宫阙殿门则纯用碧瓦。应天门旧名通天门，大定五年更。七年改福寿殿曰寿安宫。明昌五年复以隆庆宫为东宫，慈训殿为承华殿，承华殿者皇太子所居之东宫也。泰和殿，泰和二年更名庆宁殿。又有崇庆殿。鱼藻池、瑶池殿

位，贞元元年建。有神龙殿，又有观会亭。又有安仁殿、隆德殿、临芳殿。皇统元年有元和殿。有常武殿，有广武殿，为击毬、习射之所。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琼林苑有横翠殿。宁德宫西园有瑶光台，又有琼华岛，又有瑶光楼。皇统元年有宣和门，正隆三年有宣华门，又有撒合门。”此记载把宫阙的平面布局以及附属建筑叙述的非常清晰，此布局是仿自北宋汴梁宫殿制度，如宫城的前朝布局是大安殿和仁政殿，后宫有太和、神龙诸殿以及嫔妃所居的十六位等。宫城西为同乐园，东有东宫。宫城应天门外向南有千步廊，东为太庙（衍庆宫），西为三省六部。

中都的扩建，水源是大的难题，虽然宫苑生活用水有限，如果另开辟新水源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永定河（金称浑河）水流急湍，不敢轻易引流，只好延用中都西郊名叫洗马沟的小河，圈入城内，经流皇城西部，成为金朝都城的一个园林风景区，著名的同乐园，又称西华潭或鱼藻池，也就在这区域之内，经皇城宣阳门前龙津桥，斜穿出城，与南护城河汇流。这条小河流量虽小，但由古代蓟城时期就利用它，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经注》对这条小河有这样记载：“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澈，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上述记载这条小河北魏时期经蓟城南门东注，中都城扩大后把这条水括入城内，开辟了新的园囿。

中都城内修建了很多寺院坛庙，其址多选环境优美的地方，如圣安寺（在今宣武门外南横街）是著名的古刹，创建于金章宗年间，传说是金代帝后为佛觉、晦堂二大师营建的。这座寺院的位置是在中都城内的柳湖村旁，寺外垂柳成行，碧波湖水点缀着寺院幽美的环境，因此，当时这座寺庙俗称为柳湖寺。

天宁寺是处在皇城的西南隅，创建于北魏，初名光林寺，隋、唐都有扩建和更名，这座古刹到了金代称大万安寺。

白云观是我国著名道观之一，处天宁寺西北隅，创建于开元年间，金章宗明昌三年（1129年）重建，改名太极宫。泰和三年（1203年）毁于大火之中。

中都城外也有很多著名的寺庙和帝王行乐场所，如举世闻名的金山行宫（即今颐和园），是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年）所建，这座行宫四周的自然环境极其优美。万寿山在金代称作金山，昆明湖叫金水，故此依金山傍金水的行宫，由此而得名，在这样好的自然条件中筑起楼台亭阁，建造典雅的园林，供金代统治者行乐，可谓最佳之处，当时曾有“西山八院”之称。

香山寺地处中都西北郊，其山岭重峦叠嶂，清泉潺潺，林木遍于山野，景色幽静宜人。天会三年（1125年），金统治者在此开始建造寺院，至大定二十六年寺院建成，世宗完颜雍赐名“大永安寺”，又称甘露寺，完颜雍对此优美的自然环境依依不舍，在寺旁修建一所行宫。金章宗时又在这里修建了会景楼和祭星台，此后这座园囿成为历代皇家游山幸寺驻蹕的地方。

中都的东北郊原是一片沼泽地带，另有大片的湖泊、池藻，自然风景非常秀丽，金世宗时期利用这块风光秀丽的园地修建一座离宫，名叫大宁宫，利用了这片天然的湖泊、池藻来点缀这座宫殿的风景，后来大宁宫又改称为寿安宫和万宁宫，利用建筑工程

中挖掘地基多余的土,堆筑成湖心的岛屿,称为琼华岛,可见当年金朝统治者对这里建设下了很大的工力。《金史·本纪》:“命减万宁宫陈设九十四所。”由此可见大宁宫的工程修建一直不断,同时可以推论大宁宫的工程是相当豪华的,否则不能一道旨令就消减九十四项工程。这座豪华的离宫,在蒙古兵攻城时幸运的被保留下来了。

地处中都北郊一处游览胜地,称为钓鱼台,此名称至今尚保存(在海淀区阜成门外国宾馆一带),传说金章宗完颜璟曾在此垂钓,后人称为金章宗古钓鱼台,此处为西山泉水汇集之处,水域面广,流聚成池,金代文人王郁曾隐居于此“筑台垂钓”。

中都的西北隅阳台山侧一座寺院称为大觉寺,有崇宏古朴的殿宇,高大参天的婆罗树,大觉寺即为辽代清水院故址,始建于辽,沿于金代。由于环境优美,称为当时佛教胜地,寺周林木果树遍野,闹村之际山花怒放,文人墨客巡游吟咏于此,为金时西山八大院之一,又称灵泉佛寺。

镇岗塔地处中都西郊,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此处原有一条土岗,称之为龙脉,如死后葬于此,如深居龙穴,子孙昌盛,富贵吉祥,因此,贵族绅士希望子孙发绩,重金聘请风水先生踏选土岗龙穴之所在,选择窳窳之地。金时谣传土岗即将崩塌,金统治者为压住龙脉修塔一座,以压其邪,故定名为镇岗塔。

镇岗塔造型特殊,底座呈八角形,平座上有双抄重拱五铺作斗拱,每面各一攒。拱眼壁上有盆花、兽头等精美古朴的浮雕。西北面还浮雕有两武士、两文官,和中间一个鹰咀,右手执锤,形似雷公的神象,雕刻的线条朴实有力,面部表情也极为生动。塔身象一座八角亭,八面浮雕菱形格子门和直棱格子窗,塔身上部还有一层须弥座,座上有佛龕相错环绕而上,且逐渐向内收杀,略成一棱形的十三层相轮。从第二层相轮起,每佛龕内端坐一尊佛象,有的双手合十,有的两手上举,有的一手平伸,神态庄严逼真。十三层相轮上又有一须弥座,再上便是一个带宝珠的塔刹。这座塔形造型美观,通体协调,高十八米,周长二十四米,是金代建筑艺术上一个标志。

据中都城西南七十五公里的白带山,为佛教胜地,寺庙名云居寺,又称西峪寺。隋、唐时期开始刻经,石经版收藏于藏经洞中,寺院历经火焚,辽、金、元三代重修,安史之乱后刻经工作中顿,辽、金两代转胜,在寺之南侧挖洞穴一处,埋藏经版一万零八十二块,其中包括金代的一大部分,这是金代佛教史重要资料。

中都城北昌平县海子村西南,有银山南麓古延寿寺遗址,在遗址中有古塔七座,俗称银山宝塔,其中有五座是金代所建墓塔,塔身分六角形和八角形两种,用砖砌成,为密檐式,塔身向上逐层收斂,轮廓秀丽挺拔,每面装饰雕砖,精细华丽,是金代佛教艺术珍贵实物。

北京古代的都邑形成和发展与其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它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向西南延伸的小平原上,三面环山,犹如海湾状,因此,又称“北京湾”。东北与松辽平原毗邻,西为太行山麓,北与怀来盆地、宣大盆地相接连,北通蒙古高原,东南面对渤海,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在经济上更为重要,南方与北方货物的流通此处为集散之地。由于南北方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非常频繁,故是我国南方民族融汇之区。

金代灭辽后,把燕山府改名为南京,虽把原设在平州的南京中枢密院移到了这里,

执行徵收粮税、签发军丁等任务。金统治者急剧扩张南下，此时与南宋对峙，疆界由淮河至秦岭一线，海陵王继位后拟继续南进，南京城的地位尤为重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昨因绥抚南服，分置行台。时则边防未宁，法令未具。本非永计，只是从权。”在行台既撤之后，“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千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阂阂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海陵迁都的决心，这是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大的转折点。

第三节 中都的经济与文化

一、中都的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漕运、水利、建桥)

女真族建国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经济方面也是变革阶段，杰出的女真族首领阿骨打政权建立后，势如破竹相继灭了辽和北宋，到了熙宗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的改革，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由之路。在建国初期，由于掠夺式的战争使各地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海陵迁都后中都的生产得到相应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中都的建设和向南宋的进军使中都生产未能得到应有的进展，世宗以后才逐步地得以恢复。

在农业方面，中都经历了残破、恢复、发展三个阶段，由于连年战火使当时的南京城残破不堪，民生凋敝，乞丐遍于市井。中都路管辖范围按《金史·地理志》：“府一，领节镇三，刺郡九，县四十九”。在这个区域内农业生产开始复甦，到了金章宗时期更进一步采取了措施，使中都的农业又取得新的进展，金朝在农业发展方面虽然承袭了辽、宋，但也有不少的发展，在北京地区解放后出土的金代农具如铧、犁碗、耢头、牵引、锄、镢、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比起宋、辽时期的农具不但在种类上增添了很多，而且在结构上也有很多改进，犁的改进方面加上犁碗和耢头两部分，起着翻土和分土的作用，铧的规格有大小不同几种，这是为了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所需要而制造的。镰刀也有不同的样式，其他有镐、锹、铲、铡刀、垛叉等，都说明农事作业分工较细，这些都说明了中都地区的农业有很大的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工具的改进，很多荒地重新得到开垦，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记载金世宗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实际情况。《金史·食货志》：“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已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制定这些政策对农业生产发展都起着积极作用。

在中都地区农作物的产量基本保持北宋时期水平，根据土地的肥瘠大约亩产一石至两石左右，水田亩产可达三石，宋史和金史的《食货志》此类记载很多。

农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关系极其密切，丁口的增减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和破坏，熙宗以后采取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在这种安定的条件下，保证了人口逐渐的繁殖，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样就推动了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进展，海陵迁都以后带来了民族的大调动、大迁徙和大融合。《金史·食货》载：“内地”迁徙。天辅六年，“既定

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同年四月，又“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天会元年，“以旧徙润、陞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天会六年，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上述这样大的迁徙不但平衡了各地人口，而且在农业技术交流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各民族的融合，对提高人民的素质起很大作用。

中都的手工业原来有一定基础，再加上由汴京俘虏的工匠，其工种更加丰富，手工业直接生产者，重点是官府作坊生产的，有金、银、铜、铁等方面的“冶夫匠”，也有制造兵器的工匠，当时金代的兵器很发达，有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这些兵器在战争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初期至1964年北京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中都城垣范围内，曾发现很多守城用的石炮弹和灰瓶，尤其是在白云观河道北岸，一次就发现数百个石雷，这个地方是处于中都的北城垣，这种武器虽然笨拙，但对于守城来说确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

由于军事、农业生产、铸钱等需要，推动了中都地区的采矿和冶炼的发展。《金史》载：海陵正隆二年始议鼓铸，三年二月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①。金朝与矿冶有关的有大同贡铁，云内州产青磁铁，大兴府产金、银、铁，真定府产铜、铁^②。由上述看出金代对采矿冶炼是相当重视的，同时为了冶炼、烧窑以及生活需要，中都西山地区煤矿的开采又大大的发展起来。

陶瓷工业在金代也是比较发达的，这是因为辽和北宋遗留下来很多瓷窑和烧瓷技术，再者金中都的扩建需要大量的建筑上所需要的琉璃器件及宫廷中所陈设的装饰和生活用具，促使陶瓷工业恢复和发展。除著名的定窑（原河北定州，今河北曲阳县）、瓷州窑、耀州窑、钧窑（河北钧州）等名窑外，北京地区西部也曾发现多处金代窑址。其烧瓷技术、产品种类比以前更有所扩大和发展。

在纺织上金统治者也是非常重视的，据《大金国志》记载：“金俗，……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纟丝锦绡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纟丝四袖。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裤袜皆以皮。至妇人衣白大袄子，下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纟帛，上以单裙笼之”。上述可知女真人衣着可分两大类，即皮制服饰和纟帛服饰，纟帛种类繁多，除绸缎外棉制品有锦绡、朝霞绡、鱼牙绡等，这些来自渤海的纺织技术也都传至中都。在中都路管辖的大兴府各州，纺织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金史·地理志》记：“平州贡绫，涿州贡罗……”，这些纟帛制品以贸易的形式运往南宋。《金史·食货志》记：“商旅多以纟绢易茶”。茶为南方特产，北方的纟绢换取南方的茶叶，说明北方养蚕、缫丝、纺织等项手工业是非常发展的。如《金史》记载：明昌六年三月对北方边军赏劳一次就是绢五万匹，杂采

^{①②}《金史》卷五《世纪》。

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裘，承安元年十二月，劳赐北边将士“绢五万匹”。由此可见纺织作坊实力是非常雄厚，否则这样大的犒劳是不可能办到的。

迁都以后金统治者恢复了农业和手工业，随之而来的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也发展起来，因为中都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沟通南北交通重要之地，东北与中原贸易往来必然集聚于中都，这样中都就成为商品集散之地。由于商业贸易的发达给中都各行各业带来了活力，集中到中都的商品种类繁多，如北京路鼯鼠、螺杯、茱萸梳、玳瑁鞍、酥乳饼、五味子。西京路玛瑙环子、玛瑙数珠、地簪、安息香、松明、松脂、黄连、绿矾等。山东路丝、锦、绫、绢、沙鱼皮。河北路的沧盐、藁席、干鱼、干虾、瓷器、铜铁、丹粉。河东路卷子布、龙门椒、玛瑙石、白玉石。南京路的密腊香茶、地龙、钧瓷。大名府路的皱、绢、梨肉、木耳、硝。京兆府路的耀窑瓷器及麻黄、茴香等药材。凤翔府路的灯草、升麻、羌活、秦艽等药材。中都路的罗、樱桃、绫、金、银、铜、铁等。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乡镇的手工业也逐渐兴旺起来，花样繁多的商品都集中于中都，正如《宣和乙巳奉使全国行程录》所记：“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由此可见，中都的商业和贸易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金朝建立之初，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海陵迁都后至金世宗时期，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南北之间贸易往来增多，商品经济活跃，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问题，金统治者虽然设法开矿铸钱，但实际上满足不了商品发展所需要的流通货币，因此，发行纸币来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

金代发行的货币有三种，即铜币、银币、纸币，据《金史·食货志》记载：“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偷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季孙等官两阶，解职，仍杖季孙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太和四年，欲增铸钱，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后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

上述所铸铜钱在北京地区田野考古中皆有发现，其中以大定通宝、正隆通宝为最多。

金代发行的银币，是由金章宗开始。《金史·食货志》载：“承安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

纸币的发行是迁中都以后，据《金史·食货志》：“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四块金代铜钞板，即“贞祐交钞壹拾贯铜钞版”，“兴定宝泉貳贯铜钞版”两种。

这几块铜钞版附注的内容基本与金史所记载的相同，如《金史》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贞祐铜钞版所附注的条文：“伪造交钞者斩，赏钱壹万贯”。兴定铜钞版附注条文：“伪造者斩，赏陆佰贯，仍给犯人家产”。

上述三种金代发行的货币，推动了商品的交流和生产发展，使中都的经济建设呈现出一派兴旺。

为了解决金朝都城的供给，漕运问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而金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供给中都的漕粮是通过卫河、滏阳、滹沱、子牙、大清诸河，集中到天津，然后通过潞水（即白河）转至通州，每年只漕粮一项就达百万石左右，除路运少许外，主要靠水运，但通州距中都尚有四十余里陆路运输里程，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有时还受恶劣气候的影响，中断了运输，给中都造成了很多困境，金统治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拟开凿人工运河，但却有极大困难待以解决，因中都地势低于通州，白河不能逆水而上，如果利用卢沟河，风险是很大的。金世宗时决议引卢沟水至通州，以解决漕运问题。据《金史·河渠志》载：“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被灾之地，以百官从人助役。已而，勅宰臣曰：山东岁饥，工役兴则妨农作，能无怨乎。开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罢之。十一年十二月，省巨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还奏止可五十日。”

由上述可以看出凿金口河用很短的时间就竣工了，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且造成很大的灾难。《金史·河渠志》载：“……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其后，上谓宰臣曰：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駙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竟不能行而罢。”

二十五年五月，卢沟决于上阳村。先是“决显通寨，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至是复决，朝廷恐枉费工物，遂令且勿治。”

金口河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不经过考察研究卢沟河的水性就擅自决定开工，以至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金朝统治者不得不着手改善陆运，大定二十八年决定在卢沟河上建石桥。

除上述水利工程外，金代还有两项水利工程，一项是扩建中都城后，把以前辽南京城所引用的西马沟水括入城内，充分利用它点缀宫殿和园囿，据《水经注》记：“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注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铍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灤水。”

这一段记载详细叙述西马沟水之上源以及流经水道所过之处，最后注入灤水，灤水即今永定河，金时称卢沟水又称浑河。洗马沟的上源是西湖，即今广安门外莲花池，这条小河水量较小，只能解决中都部分用水，另外则是开凿长河。据《水经注》记：“灤水又东南，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又东迳蓟城东，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灤水。”上述高粱水是灤

水潜流，在蓟城西北平地而出，西北平地是指今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湖泊的前身，金代为了充分利用这条水，开凿一条人工渠道，名为长河来补充中都水源的不足。

金朝为了解决漕运之不足，积极改善陆路交通，在卢沟河的渡口上，修建一座大的石桥。《金史·河渠志》记：“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广利桥即今天的卢沟桥，桥建成后，经太行山麓，通往华北各地，同时又把各地所征收的粮税和物资集中到中都，这座桥修建工程无论是在设计上或是修建的质量上，都非常完美，桥身坚固，所需的石料都加以精选，石板之间都以铁钉锁锢，桥墩呈棱形，以减少洪水的冲力，桥墩的尖端以三角铁锢之，俗称为“斩凌剑”，当春洪来临时，冰凌浮于水上，“斩凌剑”即发挥它的威力，将浮冰破碎后，顺利通过涵洞。

桥长三百步，宽逾八步，可十骑并列通行其上，桥身用精美的大理石堆砌，两旁栏杆之间的石柱皆雕刻有石狮，其形坐卧各异，神态栩栩如生。

七百年间，桥的基础和涵洞部分从来没有整修过，说明这座桥梁无论是在设计上或建筑技术上都是精湛的，标志着金代建桥技术的高超，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辉煌的一页。

二、中都的文化(女真大小字、教育、诗词、散曲、戏剧、医学、天文学)

金代的文化很多是承袭辽、宋的，其后又有所发展，海陵迁都之后政治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促使在文化上相应的发展起来，金初还处于奴隶制尾声，诸事草创，文学朴陋，事事皆仿中原文化，但由于社会制度所限，进展缓慢，以文字来说，女真文创建于金太祖阿骨打天辅三年（1119年），它是以契丹文与汉字为基础，加减其笔划而制成。与女真文有关的契丹文字分大字、小字两种，女真兴起后，受契丹文化影响，完颜希仿契丹字做女真字，其字样是仿汉字的楷书，其文字内容取其契丹和汉字加、减笔划，择取其音或取其意而编制。按《金史》记载：“天辅三年八月己丑，颁女真字。”①金太祖所颁行的女真字为大字，是完颜希尹编制，小字为金熙宗时编制。据《金史》记：“天眷元年正月戊子朔，上朝明德宫。高丽、夏遣使来贺。颁女真小字。”现传世的女真文字只有大字一种，在出土的碑刻和器物上所刻的文字，其形状类似大字。有的传世稿件上如《弇州山人四部稿》、《方氏墨谱》等，其中所书女真文字，形制类似契丹小字。女真文的大字与小字，很多专家研究，但看法不一，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金代文学多受北宋窠臼的影响，其开拓影响较大者属王若虚和元好问，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卒于元太宗皇后称制三年，终年七十岁。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著作左郎。正大初，完成章宗和宣宗的实录，金亡后，退居山舍，所著文章有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山西太原秀容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元宪宗七年，官至左司都

①《金史》卷一《世纪》。